

越南阮氏王朝社会经济史

(澳大利亚) 李塔娜 著

李亚舒 译
杜耀文

744/02

北京·文津出版社

越南阮氏王朝社会经济史

(澳大利亚) 李塔娜 著

李亚舒 译
杜耀文

740/02

北京·文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越南阮氏王朝社会经济史 / (澳) 李塔娜著 李亚舒 杜耀文译. — 北京: 文津出版社, 2000

ISBN 7-80554-386-0

I. 越… II. ①李… ②李… ③杜… III. 经济史-越南-阮氏王朝 (1802~1945) IV. F133.33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12962 号

越南阮氏王朝社会经济史

YUENANRUANSHIWANGCHAOSHEHUIJINGJISHI

(澳大利亚) 李塔娜 著 李亚舒 杜耀文 译

*

北京·文津出版社出版

(北京北三环中路 6 号)

邮政编码: 100011

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总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市瀛洲印刷厂印刷

*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7.75 印张 166 000 字

2000 年 6 月第 1 版 2000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

ISBN 7-80554-386-0

K·49 定价: 11.00 元

目 录

著名东南亚问题专家对本书的评价	(1)
致 谢	(1)
英文本序言	(1)
中文本序言	(1)
第一章 新领土	(1)
第一节 外部环境	(1)
第二节 阮氏统治集团之前的南进	(2)
第三节 开拓者们	(4)
第四节 16 至 18 世纪越南人口的变迁	(8)
第五节 推 论	(15)
第六节 结 论	(20)
第七节 南方人口的变迁	(22)
第八节 广南以南地区人口的增长	(23)
第九节 占婆与高原人口	(25)
第二章 内区武装力量	(35)
第一节 大 炮	(37)
第二节 战 船	(41)
第三节 象 军	(44)
第四节 军事通讯和运输力量	(46)
第五节 省属武装力量	(48)
第六节 士兵的招募及士兵生活	(49)

第七节 平民政府的开始	(52)
第三章 外国客商	(62)
第一节 日本商人	(64)
第二节 中国商人	(73)
第三节 西方商人	(78)
第四节 东南亚商人	(85)
第四章 货币与贸易	(95)
第一节 主要的进出口商品	(95)
第二节 税 收	(102)
第三节 航海吨位与贸易量	(105)
第四节 铜与铸币	(108)
第五节 18 世纪的货币需求及其原因	(113)
第六节 铸 币	(114)
第七节 通货膨胀	(116)
第五章 阮氏税收制度	(127)
第一节 人头税	(127)
第二节 土地税	(130)
第三节 广南征纳的土地附加税	(132)
第四节 税制的变革	(134)
第五节 向高原人征缴的税	(137)
第六节 阮氏支付制度	(141)
第六章 越南人与高原人	(151)
第一节 阮氏的西部山区政策	(152)
第二节 贸易线及贸易品	(154)
第三节 奴隶买卖	(158)
第四节 和睦相处的民族	(162)

第七章 内区生活——另一种形式的越南人	(174)
第一节 宗教与价值观	(176)
第二节 物质文化	(182)
第三节 当前对西山起义评价中的不足之处	(185)
第四节 阮氏内区和西山起义的原因	(188)
第五节 西山运动：内区时期地方化的产物	(193)
结 论	(203)
附 录	(207)
附录一：关于交趾支那“国王”、“Quinam”和 “广南国”的称谓	(207)
附录二：三千还是三万？	(210)
附录三：荷兰人与阮氏的冲突	(214)
附录四：内区对白铅和银的使用	(220)
附录五：1690 年南部越南示意图	(224)
译后记	(227)

著名东南亚问题 专家对本书的评价

亚历山大·伍德赛德——《越南及中国模式》一书的作者、越南近代史的主要权威：

无疑这是一部成功之作，像这样一部有关越南近代史的著作问世越早，我们所有的人会获益越多。请代我向作者祝贺，祝贺她能写出这样一部充满抱负、有意义而经过深入研究的论文。本书修改发表之后将是东南亚史研究方面的一部重要著作。

大卫·钱德勒教授——《柬埔寨历史》作者：

作者为收集有关 17 和 18 世纪今越南中部地区的历史资料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这些原始资料有的是用法文和英文写的，有的是用中文、越文和日文写的。作者通过翻译手段，还搜集了用葡萄牙文、荷兰文和西班牙文所写的原始资料。作者成功地并令人钦佩地达到了预期的目标。我认为她的论文观点新颖、有理有据，令人信服，且令人读来饶有兴味，而不像许多论文那样枯燥乏味。

安东尼·里德教授——两卷本《东南亚商贸史》一书作者、国际东南亚中近代经济社会史主要权威：

以顺化地区为中心，对越南南部王朝史进行全新的解释，是本书的基本思路。作者为我们勾勒了一幅越南南方的画面，比越南北方学者想使我们相信的那种画面更具有东南亚特色，更拥有商业化气氛和多元化气质。

本书无疑为越南人民正努力塑造的新形象进行了恰到好处的描绘。为此，本书问世的时机业已成熟。

致 谢

1988年刚来到澳大利亚时，我是又焦虑又胆怯：我的英语水平有限，对于越南的了解也有限。我来自中国——一个与外界隔绝了很久的国家，可悲的是与越南也隔绝了很长时间。因此对我来说，来澳大利亚是我一生中最宝贵的机会。

我首先要感谢大卫·马尔。是他把我领入这里并成为我的主导教师，以他对越南的卓越认识帮助我，指导我。安东尼·里德教授做我的导师，使我深感幸运。他总是及时帮助我，给了我所能期望的一切支持。我感谢傅因彻、陈荆和、安雅思、安·库马、彼得·色诺斯、亨克·纳尔逊。他们在不同时期给了我不同方面的帮助，都做出了宝贵的贡献。我有机会与沃尔特斯教授谈话深感荣幸。他耐心地听取我的谈话并鼓励我将思想内容向更深层次发展。

诺拉·库克对我的学术支持和对我在完成本论著中的帮助，使我感恩不尽。我论文中，无论是内容上的还是结构形式上的错误，或是语法的错误，都逃不过她锐利的眼睛。这篇论文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她对该论文几稿的仔细阅读和生动评论。

我在巴黎做研究时，皮尔·曼桂因和阮氏英，还有姆莫·克里斯蒂安·雷戈奥在资料方面帮助了我。在越南则有阮德迎、杜文宁、黄乐和其他很多学者、朋友的大力相助，使我

更好地了解了越南。我对他们都致以深深的谢意。

我还想对汉喃学院和河内历史所致谢，如果没有他们让我阅读某些手稿，我就不可能完成我的研究。我对西贡市国家第二档案馆馆长潘廷颜及会安古迹管理委员会致以特别的感谢，他们毫无保留地让我阅读与我研究有关的资料。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慷慨地为我的研究提供了方便和支持。我对多罗西·莫因插斯、朱丽·戈登和犹德·沙纳汉致谢，她们谅解我的粗心与幼稚，并使我感受到系里温暖、友爱的气氛。我还对帮助我阅读法文资料的诺拉·福斯特和克里斯丁·阿里鲁纳斯·罗杰斯表示感谢。

我丈夫阎立宏有求必应，对我的研究工作给予了非常无私而热诚的支持，没有他的奉献精神，这部论文不可能完成。

这许多的同事和朋友们帮我完成了本著，然而，文中的缺点和错误只应归咎于我个人。

英文本序言

要想确认一起意义重大的历史事件是何时、何地 and 怎样发生的并非易事。但是在越南史上，我们可以指出是哪一年，哪一家族迁离首都的决定给越南带来了它今天几乎五分之三的领土。

1546 年郑检篡权后，原先联姻的郑家与阮家反目为仇了。据说阮潢预感大难将临，就向一位著名的先哲阮秉谦询问该怎样做。阮秉谦沉思良久回答说：“横山一带，万代容身”。阮潢于是恳求作为郑检妻子的姐姐劝姐夫把他派到顺化，做这个偏远地区的军事长官。阮潢的这步棋走对了，该年是 1558 年。

郑检这样做不过是想除掉一个敌人，但是他失算了，他给了阮潢一个王国。这之后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从狭义上说改变了越南历史，从广义上说改变了整个东南亚历史。

几乎在任何方面，阮氏都比郑氏弱小得多。北方有建设完备的国家机器，使得郑氏能统治比阮氏多三四倍的土地，掌握三四倍多的武装力量。还有，郑氏统治的土地是越南人居住了很多个世纪的土地，管理的是自己的人民；而阮氏王国建立在印度化的占婆国旧址上。占婆有着灿烂的文化，和与越南截然不同的传统。然而阮氏不仅生存下来，打败了郑氏发动的七次进攻，而且把他们的疆界向更南方拓广，一直到湄公河三角洲。新环境中的力量能生存下来甚至取得胜

利，而留在熟悉环境中的力量却失败了，这只是偶然的吗？

我对南方新生政治力量对北方政治中心不断进行成功的挑战这个现象深感兴趣。它既非始于，也不终于 16 世纪末。如果在越南历史地图上注出从 15 世纪初到 1802 年间发生的大事件，我们会发现这些事件的发生地点逐步向南推移。15 世纪初黎利在红河三角洲南部的清化起兵；阮淦于 1533 年在顺化和义安地区发动反抗莫氏的起义；1558 年阮潢开始在广治建立他的政权根据地；西山兄弟于 1771 年在归仁起兵；阮映 18 世纪 80 年代在嘉定地区建立根据地。^① 这些事件都是“南进”，即越南向南扩展的结果。渐进的向南扩张使得越南不断地出现新的边疆地区。在这个不断南移的边疆地区里，黎圣宗时成为主导意识形态的儒学与这里人们的生活却很少联系，并为新生政治力量的崛起提供了可能。我们将在本书中探讨的阮氏社会就为越南历史提供了这样一个背景。

从 17 世纪开始，红河三角洲不再是越南文明的惟一中心，一幅全新的画面展开了：升龙之外出现了另一个中心——顺化；红河三角洲之外出现了另一个经济区域——顺广。它们绝不仅仅是旧经济区的简单延伸。更确切地说，我们看到的是有着不同文化背景的新地区的发展和人们在不同环境中的工作和生活方式。南方的越南人给这两个地区起了新名称，他们称自己的地区为 Dang Trong（内区），而称北方为 Dang Ngoai（外区）。^② 正如他们在这两个名字中所认识到的一样，这明显的差异不仅确实存在，甚至于演变成了做越人的两种不同方式。这两个名称出现的意义还在于：对于南方人来说，这是两个不同的但又平等的地区。

这在越南史上是一个根本的变化。它的意义可与 10 世纪越南从中国获得独立的意义相比。形式上，它只是一个在升龙朝廷失权家族的政治生存与昌盛；而实质上，它涉及到一种新制度和一种新文化得以繁荣发展的问题。^③

虽然两个世纪中的这些变化无疑对越南文化起了建设性的作用，但是它们也确实破坏了国家的统一——这是撰写该两世纪正史的 19 世纪越南学者所不能接受的。正如大卫·马尔指出的：

越南史学家们常常被要求在他们的著作里多写进一些连续的因素，少写一些演变的因素以期平衡。

在 19 世纪正史编撰过程中，内区社会的奴隶制残余、阮氏与占婆人、日本人及高棉人之间的交往甚至联姻等非正统、或者说非儒家因素都为这种历史延续性与变异性的平衡付出了代价。^④ 大概这正与 15 世纪的官方正史编撰时的非儒学因素的遭遇相同吧。^⑤

阮氏政权的命运在现代学者的手中也好不了多少。原因很明显：国家统一与反对侵略一直是现代越南史的主旋律，倒霉的是阮氏存在与这两者都相悖而行。首先，阮氏政权破坏国家统一达二百年之久；其次，阮映在“西方殖民者”的帮助下镇压了“英雄的”西山兄弟起义。大约正因为如此，河内官方史学家们一直倾向于轻视内区的历史。人们通常只把阮氏王国看作是儒化的黎朝政权与文化的一种变异形式，与外区没有多大差别。^⑥ 人们愿谈的是 17 至 18 世纪惟一的“具有越南共性”的大越。^⑦ 然而本文所提出的论点正好相反：不仅有两个大越存在于该时期，而且南方的“大越”有着根本性的特色。从长远来看，这些特色极大地丰富了越南

文化。因此，为了阐明内区对于越南史的重大意义，我在此把重点放在了变化性而非延续性上，放在了不同点而非相似点上。

大量越南学者对这两个世纪的越南分裂政治史作了溯源研究，写成越南文或法文。^⑧一些西方史学家概略地描述了这些年间的越南政治史，^⑨这里没有必要赘述。我决定要研究探讨的也是我的兴趣所在，即内区社会特定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特征。我认为正是这些特征使得阮氏政权在各种不利条件下仍取得了长久的胜利。

还有一点是关于这个地区的欧洲名字“交趾支那”。后来该词的法文用法又引起了一些误解。正如鄂卢梭和兰姆所指出的：19世纪中期以前，“交趾支那”指的是现在的越南中部地区，在这之后则用来指南部地区。^⑩交趾支那这个名字大概是1515年托米·派尔斯首次使用的。他所指的Cauchy王国，或Cauchy Chyna王国实际上就是越南。^⑪鄂卢梭提出葡萄牙人采用了马来词汇Kuchi，另有人推测Cochin可能来源于中文“交趾”的日语发音。然而由于日本到了16世纪晚期才与交趾支那有了真正的贸易往来，鄂卢梭的观点大概仍然成立。

本书中“内区”和“交趾支那”是交替使用的。因为二者都指17和18世纪的同—地区。我感兴趣的不是这地区用什么名称最好，而是在越南史上它总是“新领土”这个事实。^⑫本书将着重研究和探讨这片“新领土”。

注解：

1. 谢志大章 (Ta Chi Dai Truong) 在他《越南内战史》《Lich Si

Noi Chien o Viet Nam》一书 (西贡，1973年版) 第38页对此作了讨论。

2. 这两个词出现于亚历山大·德·罗德所著《Dictionarivm Annna-miticvm. Lvsitanvm et Latinvmope》一书，罗马1651年版，第201页。这两个词很可能为17世纪20年代南方人所创造。

3. 自1600年起，阮潢已决定走自己的路，而对朝廷不加顾虑；其后代不折不扣地贯彻了这一观点。

4. 见大卫·马尔所著《越南反殖民史1885—1925》，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伯克利、洛杉矶、伦敦，1971年版，第4页。

5. 如现存于河内汉喃学院的一份手抄本中所说，“明命二年 (1820年)，皇帝命令Quoc Su Quan (王国史志院) 编写王国历史。该书体例、文体及史例在正式编录之前都要经过一番推敲斟酌”。(见《Han Cac Tap Luc》第18页) 自然有很多史录在这推敲斟酌中被删掉了。

6. 北方郑氏的儒教印象，请见基思泰勒所著《十七世纪越南的文人复兴》，该文收于《东南亚研究期刊》1987年版第XVIII卷第1期。

7. 外国学者中也不乏这种态度，如Insun Yu所著《十七十八世纪越南法律与社会》。(1990年版，首尔 (汉城) 韩国大学亚洲研究中心)

8. 如Le Thanh Khoi著《Le Viet Nam》(《黎氏越南》)，1955年巴黎Les Editions de Minuit出版；《Histoire du Vietnam des origines a1858》，1981年巴黎Sudestasie出版；潘旷著《Viet su Xu Dang Trong》，1969年西贡Khai Tri出版；1973年西贡Van su Hoc出版的谢志大章著《越南内战史》《Lich su noi chien o VietNam》中一文。

9. 约瑟夫·布汀格著《小蛟龙》，1958年约纽普利格出版；Jean Chesneaux著《Contribution a l'histoire de la nation vietnamienne》，1954年巴黎Editions Sociales出版。基思·泰勒所著《阮潢与越南向南扩张

的开始》是对越南历史研究最新最重要的文献。该文已被收入由安东尼·里德主编，即将由伊萨卡康耐尔大学（Cornell University）出版的《东南亚早期现代史》一书中。

10. L·鄂卢梭著“Sur le nom de ‘Cochinchine’”，《BEFEO》1924年，第24卷；A·兰姆著《通往顺化的官路》，1970年伦敦（Chatto & Windus）查图温德斯出版。兰姆在书中第12页中写道：Cachao这个葡萄牙语地理名词就是河内。他猜想 Chiao Zhi 是 Cachao 的基础。然而此地更可能是 Cacciam（或越南语的 Ke Chiem），即今清井村。当时广南王就居住在这里。见 Pham Dinh Khiem “Di tim dia diem va di tich hai thanh co Quang Nam va Phu Yen dau the ky 17”（《寻找十七世纪早期的两座古城——广南、富安》）一文，该文在1960年西贡 Bo Quoc Gia Giao Duc 版《Viet Nam Khao Co Tap San》第1卷第83页。曼桂因在其所著《les Portugaissur les cotes du Viet-Nam et du Campa》一书第185页辩驳说，Cacgao是广南境内某地。

11. 在1967年出版的《The Suma Oriental of Tome Pires》一书第114页中：“该王国位于占婆和中国之间”。

12. 这个词与越南历史上所称的“南方”有所类似。越南的“南方”一词词义随着越南的向南扩展而有些变化。顺化位于今越南中部，但由于它曾经是“大越”的南部边界，所以“南进”开始时，它被称作“南方”。《大南实录前编》（本书中简称《前编》著于1559年）记载：“清化、义安遭洪灾，人多逃往南方。”此处“南方”指的就是顺化和义安地区。“中部”一词好像到19世纪时才出现。虽然嘉隆设立北城、嘉定城等行政区域后非正式地制造了一个“中部”，但“中部”一词却不是起源于此，而是起源于1832年明命重新划分行政区域而设立中圻（Trung-Ky）。

中文本序言

我衷心感谢李亚舒和杜耀文两教授在百忙中翻译了我的论著，并使它的中文本能与我的许多老师同学和亲人朋友见面。“近乡情更怯”。

我知道这本书有许多不尽人意之处，但期望，至少它所引的许多观点和材料对国内东南亚研究同行多少有点用处。

李塔娜博士于澳大利亚

1997年4月19日

第一章 新领土

第一节 外部环境

在这块土地上最长久居住过的是占婆人。占婆位于山脉与海洋之间。这片狭长的疆土有两个显著的特点：首先，森林茂密的长山山脉由北向南地势逐渐降低，横贯占婆全境。其次，山脉又被几条湍急的河流和无数山谷割断。这形成了许多狭窄的盆地，盆地间少有地理连贯性。从自然环境看来，整个王国是由许多孤立的聚居区组成的。各条峡谷中的遗迹彼此没有任何联系，正说明了这一点。《诸蕃志》，一部13世纪的中国游记也证实了这一点。书中第一卷写道，占婆有十一个诸侯国，可被看作相互隔离的聚居区。阮氏竟设法在这“世界上最不连贯的疆土”（后人高罗所说）上建立起长达几个世纪的统一国度，真是令人惊奇。^①

占婆铭文中提到的占婆区划是该国主要的自然区划。他们是旧州（Amravati）、新州（Vijaya）和宾童龙（Panduranga）。前两者适于耕作养殖的面积相对较大，^②旧州即今天的广南，有肥沃平原面积几乎达1 800平方公里。平原由秋盆河（占婆铭文称“大河”）及其数条支流所灌溉。占婆中部的的新州就是富饶的平定平原，总面积达1 550平方公里。它以两条明晰的山脉为界，平原中有两条峡谷得到达壤河

(Song Da Rang) 与莱江 (Song Lai Giang) 这两条河流的灌溉。再次是宾童龙, 也就是国家南部。它由三条互相容易勾通的峡谷组成,^③ 包括了 Kanthara (现芽庄) 这样的特殊地区, 它在 8 世纪到 10 世纪的中国书籍甚至被称作国家。^④

顺化与岷港之间的海云隘, 是气候的分界线, 它以北是热带亚热带混合气候, 有明显的冬季, 长达三至五个月。这以南的气候有典型的热带特征。^⑤ 与狭窄崎岖的长山山脉北麓相对照, 南麓变得宽阔, 并形成了一片高原地区, 叫做西原或者中部高地。西原面积大约为两万平方英里, 宽一百英里, 长二百英里。这块高地历来用作避难所, 被军事强帮打败的人们逃往这里取得一些自由。这首先在占婆人驱赶的所谓摩伊人身上发生了, 然后, 是在越南人逼迫下撤退到这里的很多占婆人。

第二节 阮氏统治集团之前的南进

一些越南史学家提出, 19 世纪之前的所有越南历史都可以用两个词来概括: 北拒 (抗拒北方) 和南进。如果说北拒是求生存, 那么南进则是为了图发展。

南进是个很长的过程。自公元 939 年越南从中国获得独立后不到 50 年, 前黎朝的黎恒就于 982 年发动了对他的邻邦占婆的第一次进攻。他掠回了占婆皇室后宫的一百名女子和一名印度比丘。从这次进攻起, 他开始了越南南进。越南人用了七个世纪才吞并了占婆。在此期间越南和占婆两国发生了多次战争。^⑥ 这里需要注意一些定界事件。

公元 992 年黎恒派三万人去修一条起自现在的漏海口

(河静省石河县境内) 终于占婆的地哩州 (今广平省) 的道路。这是第一条越占之间的官方陆路。这条越南道路使很多代越南人得以从人口密集的北方向南方迁移。此后, 越南扩张方向明朗化了。九年后占婆人放弃了他们新近易遭袭击的国都因陀罗补罗 (Indrapura) (在今广南省县茶莽)。

接着 1069 年占婆被越人击败, 于是被迫割让三个州 (今广平与部分广治)。六年后的 1075 年, 李朝四世皇帝李仁宗下令越南人向新占领的土地上移民。

然后 1306 年, 陈仁宗以其女玄珍嫁给占王制岷为妻。送给陈朝作聘礼的两个州使越南的扩张到了今日的承天省。

最后黎圣宗于 1471 年兵伐占婆, 攻克并占领了其首都新州。

这些事件不仅标志着 5 世纪之久的越南南进的不同阶段, 而且体现了南进的种种方式: 交通、移民、联姻、战争。所有这些策略后来都被阮氏统治者所采用了。

南方一直在召唤越南人。无数民歌描绘了人们走向新土地的渴望而又充满忧虑的复杂心情:

若是真正男子汉,
就要像个人模样。
富春为你壮豪情,
同奈为你添虎胆。

南方更有巨大的发展潜力:

田野百鸟赛飞翔, 湖海群鱼竞游荡。

从实际出发, 它也是越南可能扩张的惟一地方。正如 18 世纪著名官员阮居贞所说: “西去无路, 北进艰难, 所以我们应尽力南征。”^⑦

南进成为越南史的真正动力。虽然这期间，北方也发生了几起重大事件，有过几次重大制度变革，但从长远意义上看，没有一件可以与南进相提并论。升龙成为越南的政治中心和社会模式以后的几百年来，只发生过几件重要事件。权力争夺、战争、饥荒，甚至阮惠战胜清朝的胜利，都毫无新意。正如西山兄弟所评论，“升龙王气已失”了。^⑧升龙（河内）只是个历史背景，是古时就已完成的一件杰作。南方才有新潮流，才是新英雄的用武之地。

在这几百年来的东南亚大陆上不只是越南的疆界在移动，缅甸疆界由北向南，泰国疆界由东向西都在推移。H·本达评价说：“农民向东南亚大陆上的三角洲移动的现象构成了今日缅甸、越南与泰国的社会经济史最重要的篇章”。^⑨但是如下文所说，迁移的不仅仅是农民。

第三节 开拓者们

后黎朝流放囚犯的遥远南方出现了生机。《历朝宪章类志》上说，从1474年（越南力量抵达华列拉（Varrella）角的三年后），黎朝政府决定把囚犯遣送到占婆旧地。罪轻的遣送到升华（广南升平地区），罪重的遣送到思州、义州地区，怀仁（今平定归仁）则是最远的流放地。^⑩

这也是自古以来越南政治流亡者的避难所。1407年明朝派兵进入越南后，陈艺宗的儿子陈简定起兵抗击。在这期间他的支持者们积极奔走于顺化地区和化州（今承天省广田县地区）之间。化州也是短命的后陈朝（1407—1413）皇帝陈季扩的根据地。实际上，当黎圣宗于1471年进攻占婆前

列数占婆王罪状时，有一条就是窝藏大越的囚犯。^⑪

因为有这样的背景，所以阮秉谦建议阮潢去南方也就很自然了。阮潢并非独自去的，《前编》记载了很多1558年随阮潢去顺化地区的官员及家眷，很多皇室和义勇（富豪的家丁们）也来了。毫无疑问他们中很多人并不是像阮潢那样逃避厄运，而是在新土地上寻求更光明的未来。

我们还应简要地提到除阮氏及其追随者以外的另一支贵族，他们来到南方并长期定居下来。广南某部家史记载了他们的祖先是黎维智的一名高级军官。黎维智是黎敬宗（1600—1619）的兄弟。1619年郑氏逼黎敬宗缢死后，黎维智及其追随者逃到了清化东山县。1623年他们又在那里迁移到广南奠磐县清州村。^⑫《前编》上还记载，1558年某些黎朝高官和阮氏老家清化的几个家族一起随阮潢去了南方。^⑬

早先有些越南人响应12世纪李仁宗的移民号召，迁到了南方。不幸的是很难再找到他们的踪迹，然而广平和广治的某些村民还暗示他们来过这里。据潘旷说，今明灵地区一些村名在《鸟州近录》中被写成“Xa Phan Xa”，在喃字中意为潘家。还有“XA Ngo Xa”，意为吴家。这样的话，这些村名就表明早期移民主要是以血统宗族关系移居的。^⑭令人不解的是在明灵地区的北部，却找不出类似的村名。卡迪埃的论点是，12世纪越南人从北方来的时候，并没有在布政北部停留，而是直接去了更南部的临平（广平丽水地区），因为那里的土地肥沃一些。卡迪埃还说，到黎圣宗时代布政才得到了开发。^⑮

虽然12世纪南进还没有明确的证据，但是广南和广义

地区一些家史中对 1471 年黎圣宗大破占婆以后的历史有较详的记载。如会安地区甘清村陈家碑文所记：

在洪德时期（1470—1497），我们的祖先及家人从顺化应征去占人领土上作战。因他战绩突出，获允留在广南地区。他发现了一条近海大河 [当为秋湓河]，就带领人们来到这里，并建起了村庄。此碑立于 1498 年 1 月 10 日。^⑩

碑文表明，战争结束后部分越南士兵留在了新占领的土地上。然而因资料不足，我们不知他们的人数。^⑪

同时，北方的农民也不放过在军事胜利后取得一片新土地的机会。会安地区锦南村一部黄氏家史记载：

我们的祖先是北方人。洪德时期，因为我们国王擒获了占婆王，我们祖先就乘此有利时机来到这里落户。^⑫

上述资料还表明，尽管广南地区早在 1402 年已正式落入越南人之手，但 1471 年之前他们并没有对该地区实施有效控制。

虽然从 12 世纪到 15 世纪都有越南人从北方迁到南方，但他们居住得很分散。占婆人一直想收复故土，而黎朝官方无心再扩张。对黎圣宗来说，1471 年越南人掠夺的土地是最后一块夺得的土地了。战争结束后他令部下在临近华列拉（Varella）海角的石毕山下铭刻告示，言明这是占越之间的界定领土和最终边界：“占婆人过此，兵败国灭；安南人过此，兵死将亡。”

1558 年阮氏统治集团的成立是南进过程中的一座分水

岭。从这以后，越南人像河水一样缓慢但不断地流过占越边界向南移动。

由于人力匮乏，阮氏欢迎并吸引从各地来的人。新来的人居住的头三年不必纳税；他们开垦的土地被视为私有财产。还有，1669 年之前，政府税收过粗，很多地方从来就不知道税是什么。^⑬所有这些因素无疑都吸引了北方人。

南进的某些方面还需要更详细地分析。其一是清化和义安的作用，这两省对南进历史至关重要。它们首先是提供了新居民。从 16 世纪末到 18 世纪中叶这段多灾多难的时期，越南半数饥荒都发生在这两个地区。而因为它们地理上与南方接近，又成为越南人南进的跳板。

很多在阮氏时代历史中扮演重要角色的人物，来自清化和义安地区。倡议建造广平的两座长城的官员陶维慈，阮氏统治集团时代两大名将之一的阮有进都来自清化。阮福渊时代（1691—1725）的名臣阮登第和另一位阮福阔（1738—1765）时代的名臣阮居贞的老家都是义安。^⑭西山兄弟祖籍义安也为众所周知。

另一个值得进一步探索的方面是宗族的作用。在鼓励血统宗族而非个人或核心家庭的向南移民中，越南传统的强烈的家族纽带观念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会安的锦铺村黎家碑记载：

据说嘉裕皇帝（阮潢）开发顺广地区不久之后，我们的祖先就来到这里。他们来自北方，但省份不详。他们是与三个家族一起来的：黄氏、陈氏与阮氏。^⑮

正如前面讨论过的，这股移民潮流以姓氏命名了一些村

庄(如前所示)。然而,很少有家族从北方直接深入南方。承天省富荣县的团有忠(1866年一次起义的领袖)家族就是个典型的例子。据他的家史记载,他的祖先最先是清化或义安迁到南方的。他们先是迁到广平,建起了一个叫做 Chuon 的村庄。他们在那里住了“很长”时间。然后他们又向南移到了承天。他们在这里建起的村子叫做 Chuon Ngon (Chuon 之枝)。而广平的 Chuon 村被重新命名为 Chuon Goc (Chuon 之根)。^②我们发现有多类类似的例子可以表明越南人是由北往南、再往南地扩张的。又如《大南列传正编初集》所记录的嘉隆期间一名高级官员范登兴家族。阮潢在顺化建立政权后,范就把全家由北方迁移来。他们最先留在武昌县(今广治省内),然后又迁到更南方的香茶县(承天省内)。他的曾祖父又把家迁到更南方的广义,这之后他祖父更把家迁到更远的嘉定。^③

越南人对南方总是充满了美好生活的梦想。南方永远是他们施展本领的地方。比较一下《大南列传前编》和《大南正编列传初集》,我们会看到阮氏统治集团的核心成员主要来自清化,而阮映统治集团的核心成员则是由中部迁到南方的。即使没有共享这美梦的皇族黎氏也不情愿地参与了南进。1833年黎维良叛乱失败后,明命强令他们从清化迁到广南、广义和平定。他们从那以后甚至被禁止有任何相互来往,^④越南语言学家黎玉铸就是这被迫迁移家族的后代。^⑤

第四节 16至18世纪越南人口的变迁

法国学者高罗谈起东京人口时谈道:

向遥远的地区移民,能保证这些移民在蜂拥而至的农民大军中找到就业出路吗?这个问题很重要,值得研究。但是由于这方面也缺少统计数字,我们作不出精确的回答。^⑥

虽然专家们对越南人“气势磅礴地”、“目标专一地”向南迁徙意见一致,但是他们在判断移民作为整个南方人口增长的因素究竟起多大作用时却犹豫不决。斯摩尔斯基谈起1901年到1936年交趾支那的人口增长率时提出,移民在整个人口增长中只起1.2%的作用。^⑦高罗说在20世纪20年代:

每年人口减少总额(从红河三角洲向南的移民)为15 000,而出生人口比死亡人口的超额为65 000或者很可能接近100 000。^⑧

即便如此,九分之一到五分之一的生死差额人口迁移到另一个地方亦是不小的数字,对于古老而人口稠密的东京是如此,对于新开发且人口稀少的交趾支那就尤其明显了。1417年顺化地区有记录的人口仅为大越总人口的2.3%。据《安南志原》记载,该年仅只有3 602户,10 400越南人在顺化居住。然而1847年阮朝丁簿提供出全国有1 024 388万名纳税人的数据。

如果根据前内区和前外区来划分这个数字,那么:

内区人口(广平及其以南)444 992;

外区人口(河静及其以北)579 396。^⑨

这表明到19世纪上半叶时,总人口的百分之五十五居住在越南的旧有土地上,百分之四十五居住在新领土上。我们能看出这两个数字多么接近。在仅仅几百年期间越南人不

仅在疆土上扩大了一半，而且在人口上增长出了又一个越南。

大概由于这个时期的人口统计资料太少，而且不可靠，所以至今没有人尝试去做细致的研究。我原先也宁愿不冒这个险，然而现有资料虽然确切数字很少，却有很多我认为可靠的陈述性段落或文章可以作为与一些有限数据做比较的根据。因为这个论题的历史意义如此重大，所以我还是愿意冒风险做一份较长篇幅的探究。

对越南南进的一个常见解释是在有限农业土地上人口压力过大。然而人民大批向南迁移的直接原因却是饥荒和战争，而且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移民大潮常常是在人口缩减或处于缩减危险的情况下才发生。

16至18世纪之间的两大灾难时期是难民人数增长的主要原因。第一场灾难发生在16世纪后半叶。从1559年起，1561、1570、1571、1572、1586、1588、1589、1592、1594、1595、1596、1597、1608等年份在《大越史记全书》一书中被引人注目地一次又一次提到。下面的例子发生于1572年：

是年义安各县田野荒芜，一谷不收。民大饥饿，更被瘟疫，死者过半。人多流亡，或散之南方，或漂居东北，境内萧然。^⑩

下例发生于1594年：

其时，海阳诸县人民大荒，饥馑相食，饿死者三分之一。^⑪

这或许是越南历史上延续时间最长的灾难时期：数十年内战接连不断，49年内有14年农业灾害。在此之前的越南

史上从来没有过这么短的时期内反复地提到如此多的难民。实际上“漂散”二字在1571年以前的越南史上从没有出现过。

该时期的越南人口一定处于低潮。除去在饥荒和瘟疫中死去的人，黎莫之战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1539年至1600年间有过40多次大战，升龙和清化经常是战场。一位越南学者统计“数十万青年男子死于该时期”。^⑫他的话从《大越史记全书》的几段文字里可以得到证实：

(1555年) 贼兵死者塞河，河水皆赤……

贼兵数万余众，死亡略尽。

(1581年) 斩六百级。

(1589年) 斩首千级。

(1591年底黎氏重占升龙的战役中) 斩首万余级，血流遍野，尸积成山……残卒相争上船。船中人恐覆，以剑断手，落水死者过半。

(1592年初，还是在重占升龙的战役中) 莫兵横尸相枕，填委沟壑，血流漂杵。

(1593年2月) 斩获数千级。

(1593年5月) 斩首万计。(1595年) 斩首六百级。(1596年) 斩获贼首2268颗。

即使允许胜方有所夸张，若加上与连年战争时间相结合的自然灾害，无疑越南人口在这段时期内是减少了。

与北方惨象相比，顺化相对来说平安一些。虽然莫氏1571年曾企图袭击顺化，阮潢胜利地击退了他们。《大越史记全书》和《前编》上都说该地区“市无二价，人不为盗，诸国商舶凑集”。^⑬这是北方难民天然的避风港。《前编》还

提到1559年和1608年有两股难民潮水般涌入顺化。《大越史记全书》写道，这段时期从家乡逃出来的人们“或散之南方，或漂居东北”。这两个地区人口都比较稀少。

16世纪末期越南经历了第一次移民大潮。作为历史事件它可与中国东晋（公元四世纪）时期由北方向长江三角洲的大规模移民相比。这时期之前迁移到南方的人数只是零星的，而现在他们的动机更加强烈，目的更加明确了。如果说顺化以前在许多方面看来是块不安全、不确知的地方，那么现在阮氏政府的建立再次确认了越南人在这里的居住权，因而极大地鼓励了移民。

18世纪三四十年代显示着第二次移民大潮。据《越史通鉴纲目》记载，1730年北方有527个村庄的居民逃离家乡。这种趋势在此之前早就出现过。在1681年有一次大饥荒，^⑤18世纪初的五年内清化就有三年歉收。接着在北方的其它区域又有1712年、1713年和1721年的饥荒。1726年和1728年，郑氏不得不从国库中取出二十万银两来救济清化和义安地区的灾民。1729年红河三角洲洪水泛滥，1736年瘟疫流行，18世纪40年代的情况更糟。在18世纪中期，著名学者吴时仕给政府的奏章中写道：

红河三角洲原有9668个村庄，其中有1070个消失了，这大约相当于一个州（指面积区划，当时红河三角洲有4个州）的村数。

顺化原有1392个村庄，但其中297个消失了。

义安有706个村庄，其中115个消失了。^⑥

看来可能至少百分之十五的村庄消失了。上例中人们逃离家乡的主要原因是为了躲避抗郑起义。《越史通鉴纲目》

中写道，武仙、舒池、建昌等县（今太平省内）和真定（河南宁省）情况好一些。然而据黎氏支系的家史，由于战争，即使在上述情况较好的各县，“成百家庭流离失所，每斗（二十八升）大米价值数百文，每村仅有六至七人，有的村只剩下四至五人”。^⑦

越南难民问题在《清实录》中的1738年和1743年之间也多次提到。据此资料，先是1738年有些中国人买越南人为奴。然后《清实录》又数次谈到1742年6月8日和1743年2月4月跨过中越边界来到中国的越南难民问题，以及中国人购买越南青壮年问题。有篇报告甚至声称“战后（北方叛乱），安南地区十室九空”。^⑧

有一份写于1780年的义安德光府清漳县武烈社的报告书，叫做《武烈社申簿》，详细描述了人民的流失倾向。书中说，黎氏政府在1722年决定严格注册纳税人，结果该乡人民不论贫富都逃光了。于是由留在乡里的老弱者来充数，而由于该乡需出的兵丁数目不变，给该乡造成了更重的负担，使更多人逃亡。1740年政府命令该乡出53名兵丁，其中有36名由于不合格被遣回。为了让父亲回来后儿子去充军，军官扣起他们的家人加以拷打；如果兄长退役了，弟弟要去顶替他在军中的位置，然而这样村里还是满足不了政府的需要。很多被征入伍的人刚一登记就溜走了。有一次该乡有20多户人逃走。1774年北军南征时，又从该乡征募20名壮丁，军队回师时这20人都没有返回来。1776年到1779年所有庄稼歉收，同时又有一场瘟疫爆发，据称该村活下来的不到半数。^⑨

我们现在看看典型越南村庄的大小：